

#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 民事裁定书

(2020)粤19破终4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曹型雁,女,汉族,1970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路坂田台湾花园信义楼206号,公民身份号码:51022519701015192X。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萍,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东莞市桂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三元里今日大厦六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丁永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南城尚城学校,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二路百悦尚城小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1900690517129C。

法定代表人:曹型雁。

管理人: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曹型雁、东莞市桂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禾公司)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

破 15-1 号、15-2 号民事裁定，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 年 5 月 17 日，原审法院裁定受理东莞市南城尚城学校（以下简称尚城学校）破产清算一案，指定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为尚城学校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该案审理过程中，曹型雁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桂禾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以尚城学校的名义向原审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

尚城学校系于 2009 年经东莞市教育局批准开办的民办学校，桂禾公司系该学校举办者。经原审法院听证，桂禾公司在听证中明确以尚城学校名义向本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尚城学校章程显示，尚城学校董事会成员分别为曹型雁、魏安华、李中良、罗丽燕、曹型英。曹型雁主张其已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尚城学校与债权人和解，并提交了董事会决议作为证据，决议显示：“积极与债权人协商，达成破产和解意向并签订破产和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管理人提出破产和解申请，并提交相关和解草案”，并附有李中良、曹型雁、曹型英签名。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破产受理后，管理人具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职责。本案中，虽然曹型雁为尚城学校法定代表人，并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但尚城学校已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其代

表尚城学校的权利已然受限，如曹型雁认为尚城学校符合破产和解受理条件，应与管理人协商，由管理人履行职责代表尚城学校与债权人和解，而不得以自身名义直接向原审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规定：“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本案中，桂禾公司明确以尚城学校名义向原审法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但其与尚城学校分属不同法人主体，桂禾公司无权代表尚城学校向原审法院提出重整申请。故桂禾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其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分别对曹型雁提出的破产和解申请、桂禾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裁定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作出上述裁定后，曹型雁、桂禾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曹型雁上诉称：一、债务人提出破产和解申请是法定权利。1.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提出破产和解是法律赋予债务人的权利，且提出破产和解的主体有且只

有债务人，目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有权提出破产和解。2. 曹型雁依法拥有代表尚城学校的权利。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并非是民办学校的决策机构，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才是学校的决策机构，只有决策机构才有权负责学校的运营及制定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等重要职权。从管理人查阅尚城学校在东莞市教育局的档案资料可知：尚城学校已设立董事会，为学校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成员为董事长曹型雁，董事魏安华、李中良、罗丽燕、曹型英。曹型雁已组织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讨：“1. 积极与债权人协商，达成破产和解意向并签订和解协议：2. 向人民法院、管理人提出破产和解申请，并提交相关和解草案……”因尚城学校公章早已被法院暂扣，后又由管理人掌握，曹型雁无法获得东莞市南城尚城学校的公章，因此只能依据尚城学校董事会决议代表尚城学校提出破产和解申请。曹型雁虽是一名自然人，但同时是尚城学校登记的负责人、董事长，是尚城学校法定代表人，依法对外代表尚城学校意志，曹型雁有权代表尚城学校行使法律赋予债务人的权利。因此曹型雁代表尚城学校提出破产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二、管理人提出破产和解没有法律依据。1. 管理人不能等同于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的产生来源于人民法院的指定，管理人经人民法院指定后，管理人在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

督下，依法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负责对债权申报登记，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债务人财产的追收、变价、分配，负责对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和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是破产事务的执行人。管理人仅作为一个专业社会中介机构，履行其法定职责，该职责更多体现在债务人内部事务上，对涉及到债务人、债权人的重大利益等事项并无决定权。而破产和解直接关系到债务履行期限的延长、债务的减免等，是关乎债务人能否继续存续、以何种方式存续、债权人债权能否实现、以何种方式实现等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显然不能由管理人这么一名“外人”来决定是否破产和解而排除利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企业破产法》对破产程序中可能出现的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情形下各个破产活动参与人的不同权责进行明确，也侧面印证了管理人的职责并非可以随意扩大的。

2. 管理人的职责不包括申请破产和解。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管理人的职责并不包括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也就是说管理人提出破产和解申请没有法律的权利来源，管理人不能提出破产和解申请。

三、本案破产和解申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1. 从主体上看，债务人代表已经提出了书面破产和解申请，符合法定启动条件。曹型雁作为债务人代表已经向管理人、原审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并提交了相应的和解草案、和解协议等文件，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2. 就破产和解事宜，曹型雁代表尚城学校已多次与管理人沟

通、商议，并分别于2019年6月4日、2019年7月17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2019年8月14日向管理人提出破产和解申请及提交相关书面文件。在2019年7月29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广大债权人已表决通过了同意对债务人进行和解的决议，截至2019年8月5日，曹型雁代表尚城学校已与大多数债权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债权193454413.06元，和解比例高达83.99%，但管理人却置事实于度外，带着一味的偏见，拒绝有效沟通，拒绝破产和解，不但没有依法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且违背了广大债权人的意愿。3. 债务人根据与债权人达成一致的和解协议，已制定和解草案，并分别向管理人及原审法院提交。该草案从和解的现实性、必要性、可行性等各方面进行了阐述，并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债权人人数及超过三分之二债权额的同意，法院应当尊重债权人的和解意见。四、管理人未能尽职履行管理人职务。除了以上管理人不依法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外，管理人还存在多处失责行为，具体如下：1. 错误引进管理方，排除原管理团队。明知学校开办方桂禾公司原股东与现股东之间存在纠纷且已有生效判决文书的情况下，未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而与桂禾公司签订《托管协议书》，允许桂禾公司进入学校管理。而作为桂禾公司现股东，一直管理着学校并取得优异成果的曹型雁团队却被管理人排除管理学校，管理人的做法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学校也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反而是增加了各方矛盾。2.

管理人没有依法执行债权人会议决议。第一，没有执行破产和解。曹型雁早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提交了破产和解申请，并经债权人会议讨论、决议通过对债务人进行破产和解、否定了破产重整。《企业破产》第九十六条明确了是否符合破产和解的审查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但是管理人却越权以自己的名义回复否定了破产和解，管理人的回复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二，擅自进行重整准备活动。明知债权人会议否决破产重整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重整投资人招募并进行一系列的评估、招募工作，管理人的独断决定不但没有法律权利依据，直接违背了债权人、债务人的意愿，而且还直接增加了债务人成本的支出、损害广大债权人的利益。3. 贱价处理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接管学校时，学校的运营资金充足，但是管理人却以一万多元处置了购入价为 1 00 多万的集装箱，严重损害了债务人财产。4. 排除债务人的知情权。债务人依法参加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并没有向债务人送达相应的会议决议、会议报告等文件，是故意不向债务人披露学校情况，造成债务人信息不通，直接影响到债务人的知情权，导致债务人无法依法行使法定权利。综上所述，曹型雁有权代表尚城学校依法提出破产和解申请，且已向法院提交了根据债务人与大多数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制定的和解草案，并多次与管理人进行了协商，尊重管理人。但如因协商未果就否定债务人的申请，不但剥夺了法律所赋予债务人的权利，且人为地给管理人增设权力，完全违背了《企业

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综上，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 1971 破 15-1 号民事裁定，裁定同意尚城学校提出的破产和解。

桂禾公司上诉称：一、桂禾公司是尚城学校的举办者，尚城学校的出资额均由桂禾公司完成。因为桂禾公司在深圳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专业度、信任度，深建房地产公司于 2005 年相邀来东莞举办尚城学校，从 2005 年起至 2009 年，学校开办的所有办学手续和前期工作都是由公司组织团队执行，投入广泛的专业资源和人力资料及资金；2005-06 年项目的前期市场调查和签约阶段，桂禾公司考察了国内外的优质学校。2006 年与开发商签约，组织专家研讨，打造东莞第一家环保生态学校，前期所有费用均由桂禾公司承担，并于 2008 年申请筹办，2009 年取得办学许可证，从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至今，学校举办者一直都是桂禾公司。二、尚城学校并没有办学场地的租赁合同。办学场地的租赁合同是由东莞市深建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桂禾公司签订，租金在尚城学校破产宣告前是桂禾公司委托尚城学校支付给东莞市深建房地产有限公司，尚城学校被宣告破产后，租金由桂禾公司支付给东莞市深建房地产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支付了 2019 年下学期的租金给东莞市深建房地产有限公司，从尚城学校被宣告破产后，尚城学校占用场地租金由桂禾公司支付，不委托尚城学校支付了，尚城学校目前一直没支付租金给桂禾公司。2008 年 1 月 9 日，东莞市深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建公司)与桂禾公司签订了《东莞南城百悦尚城小区配套学校合作办学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办学协议),深建公司提供学校土地使用权、校舍和园林等基本建设给桂禾公司使用,自2011年9月1日起,桂禾公司向深建公司每年交纳租金250万元,且自2011年交纳租金始,每三年租金递增不少于3%。桂禾公司曾向管理人提出从学校经费中支出租金给桂禾公司,但管理人至今未支付任何租金给桂禾公司。三、作为尚城学校的举办者和场地提供方、托管方,桂禾公司有权提出重整方案。2019年7月19日,南城街道办事处和桂禾公司签订了《尚城学校管理承诺书》及尚城学校管理人与桂禾公司签订了《托管协议书》,托管的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止,桂禾公司对尚城学校的经营、教育教学活动非常熟悉,桂禾公司作为尚城学校的出资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提出重整。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在桂禾公司2019年5月25日提交的重整计划书中,是以桂禾公司作为申请主体并加盖了公章。而在原审法院听证过程中,审判人员询问申请人以谁名义代表申请尚城学校破产重整,该发问本身存在逻辑错误,申请破产重整的主体应当是具体明确,而不是代表关系,所以该发问具有一定的诱导性,审判

人员应当明确提出桂禾公司是以桂禾公司还是以尚城学校作为申请主体，并非用代表来进行发问。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 1971 破 15-2 号民事裁定，准许尚城学校进入重整程序。

案经本院审理，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尚城学校管理人在原审法院审理尚城学校破产清算一案过程中，代表尚城学校向原审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原审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作出（2019）粤 1971 破 15-3 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尚城学校进行重整。

本院认为，针对曹型雁及桂禾公司的上诉意见，分析如下：首先，曹型雁虽为尚城学校的负责人，但尚城学校已被裁定受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审法院已依法指定尚城学校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在破产受理后应由管理人代表参加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以及履行法定的其他职责，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的相应权限理应受到限制，且在本案中，曹型雁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代表尚城学校所提出的和解申请系经尚城学校章程所约定的程序所作出，故原审法院对曹型雁所提出的和解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妥。其次，桂禾公司在一审期间明确系以尚城学校的名义提出重整申请，其与尚城学校属相互独立的法人，原审法院认定其无权代表尚城学校提出重整申请并无不妥。桂禾公司所提出的尚城学校办学场地、托管方等方面的意见亦不足以构成其重整

申请应予受理的依据。另外，原审法院已裁定同意尚城学校管理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曹型雁、桂禾公司对尚城学校债务清理的相关意见、方案，可与管理人反馈、协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佳阳

审 判 员 雷德强

审 判 员 杨洁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奕霖